

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书



哲学的改造

[美] 约翰·杜威 著
张颖 译
邹铁军 审校

陕西人民出版社



开场白

今年二三月我应邀在东京日本帝国大学讲学，我试图解释现在在哲学中进行的观念和思想方式的改造。尽管这些讲座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特殊立场的痕迹，其目的还是展示新旧类型哲学问题之间的一般对立，而不是替这些问题的任何特殊解决方法提出偏袒的请求。在多数情况下，我试图显示使知识改造变得不可避免的力量，并且预想它必须沿着前进的一些路线。

任何享受了日本独特的好客精神的人如果竭力想做一个在任何方面同其受到的善待相同的答谢的话，他会感到困惑之极。但是我必须用白纸黑字记下我对他们的感激，特别是东京大学哲学系成员，以及我亲爱的朋友小野博士和新渡户博士的礼貌和帮助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约翰·杜威

1919年 9月

译者序言

约翰·杜威（原名杜威）是 20 世纪美国最著名的教育学家、哲学家、伦理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政治活动家。他不仅在美国是“首屈一指”的，而且在国际上也是世界级的大师。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说：“一般公认他是美国现存的首屈一指的哲学家。这个评价我完全同意。他不仅在哲学家中间，而且对研究教育学的人，研究美学的人以及研究政治理论的人，都有了深远的影响。杜威是个品性高洁无比的人，他在见解上是自由的，在待人接物方面宽宏而亲切，在工作中孜孜不倦。”（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 1957 年版，第 785 页）当代美国著名的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把杜威同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并称为当代世界上最著名的三位哲学家。

杜威 1859 年 10 月 15 日出生于美国佛蒙特州伯林顿城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曾任佛蒙特骑兵团的军需官。母亲家庭富裕而有教养，非常重视子女教育。杜威就读于伯林顿公立学校。1879 年考入佛蒙特大学。大学毕业曾在中学教书。是佛蒙特州大学教授托莱·哈里把杜威引上了哲学之路。1884 年



年入霍普金斯大学深造，~~1890~~1890年以《康德的心理学》为题的论文取得博士学位。先后在密歇根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学校任教。他曾任美国心理学会会长，美国哲学学会东部分会会长，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会长等。杜威一生出版了~~猿~~猿部著作，发表了~~忽~~忽多篇论文，为人类思想宝库增添了思想瑰宝。

由皮尔士首倡的实用主义，由詹姆斯开创的实用主义哲学运动，到杜威时发展到了巅峰。杜威~~1917~~1917年~~缘~~缘月~~猿~~猿日逝世后，实用主义一度步入低谷。但很快实用主义同分析哲学合流，新实用主义很快又占领了美国的哲学舞台。一种哲学历经一百多年历史，经久不衰，这表明这种哲学有深厚的历史背景，有深邃的理论基础和保持着不断进取的理论活力。

这种不断进取的理论活力在杜威的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哲学的改造》一书的出版和修订就是最好的说明和例证。《哲学的改造》一书是在杜威~~1919~~1919年二三月应邀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所作讲学内容的基础上于~~1920~~1920年出版的。

这中间还有一段十分重要的插曲，也就是在~~1919~~1919年春天，杜威应中国五个教育团体的邀请，于同年~~缘~~缘月~~员~~员日，从日本取道来到中国的上海，~~缘~~缘月~~源~~源日中国就爆发了震撼世界的五四运动，这使杜威这位主张民主、酷爱自由的著名社会政治活动家产生了极大兴趣，他把原定的短暂的讲学，一下子延长了两年零两个月，走遍了半个中国，做了数十次讲演，不仅传播了实用主义和西方文化，而且对东方文化也做出了较为中肯的评价。他主张不论对西方文化还是对东方文化，都不要全盘否定，也不要全盘接受。表现出一位大思想家的坦荡胸怀和科学态度。一位西方的著名哲学家在中国待的时间之长，讲学次数

之多，对中国思想界影响之深，这在中国现代史上是无人可比的。实用主义成为中国人最熟悉的西方哲学，杜威也成为中国人最熟悉的西方哲学家。这也许是中国人对杜威的《哲学的改造》特别关注的重要原因。

在实用主义的殿堂中，有两位大哲学家格外引人瞩目，那就是詹姆斯和杜威。詹姆斯对实用主义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是他把沉睡了 150 年的皮尔士原理重新加以阐释，从而开创了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运动。他的《实用主义》一书不仅是实用主义的经典之作，而且也是世界哲学宝库中的经典之作。另一位则是杜威，他对美国实用主义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是杜威使实用主义沿着一个正确方向，即始终和社会和时代紧密联系起来，是杜威保持了实用主义的理论活力，是杜威使实用主义深入到美国人的心中。他的《哲学的改造》一书同样是实用主义的经典之作，同样也是世界哲学宝库的经典之作。所以，有人说杜威哲学是美国工业化时代的哲学。罗蒂把杜威视为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思想先驱。所以，美国历史学家康马杰说：“杜威忠实地实践自己的哲学信条，最后成为美国人民的良师益友和良心。”（见《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51 页）

但是，詹姆斯与杜威又有很大的不同。我只想谈其中的两点。其一，詹姆斯的《实用主义》文笔流畅，如行云流水，人们一读马上就会明白说的是什么，虽然常常是好像明白，但未必真正明白，或者说只是字面上明白，但未必能把握其实质。杜威的《哲学的改造》则不同，读起来很费劲，人们必须深思熟虑，方能把握住杜威的思维方式和杜威所要告诉我们的思想。这次，由张颖教授翻译的杜威的《哲学的改造》，就是力

求严格地保持杜威的学术风格和准确地翻译每句话的原意，从而使我们把握一个真正的杜威。其二，以作教师来说，詹姆斯是一位非常称职和优秀的教师，他讲课时教室的过道都坐满了人，他讲完课学生向他热烈鼓掌并献上一个爱环。相比之下，杜威则可以放入最差的教师之列，他生性腼腆，受黑格尔的影响，语言晦涩难懂，但从对学生的培养来说，杜威又无愧于最伟大的教师。杜威善于用新的和敏锐的眼光去发现学生思想中的新思想萌芽，并加以鼓励和培养，使之茁壮成长。所以，杜威培养了一大批才华出众的学生，如克伯屈、贾尔兹、胡克、赖特那、胡适等。

杜威作为一位世界级的大哲学家，他和大多数哲学家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不是固守在哲学家的永恒的主题之上，而是在时代的发展变化的现实世界之中寻找自己的哲学的生长点。这一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一点在《哲学的改造》中体现得特别充分。他认为哲学不是哲学家头脑中臆造出来的，它必须在哲学的发展的历史中，在工业、宗教、政治、社会和科学的发展所产生的深刻变化和危机中，去寻找哲学改造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去建筑新哲学发展的生长点。这一点不仅是《哲学的改造》一书贯彻始终的指导思想，也是杜威一生始终不渝的哲学信念，这也是杜威思想生命力的活的源泉。

杜威对哲学的改造，并不是在传统哲学的基础之上的修正或增补，而是在对传统哲学的否定基础上的重构。

首先，杜威考察了哲学改造的历史因素。他对人类思想发展历史研究，指出培根是现代思想的真正建设者，他背叛并批判了人类思想的最高权威亚里士多德，成为人类新精神的代表，他的最大功绩并不是归纳法，而是发现理论和发现法，他

使人们从注重过去转向注重未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杜威把培根视为新精神的代表。培根的新精神和新倾向在于发现的理论，在于强调新的事实和新的真理的发现，在于不断地去探究自然的秘密。自然的秘密是隐藏着的，人们必须不断地去挖掘它、发现它。正如培根指出，靠纯粹推理来制造体系的人，犹如蜘蛛从肚子里往外吐丝；靠积累材料和经验的人，犹如蚂蚁贮藏和搜集原料；真正的工作是蜜蜂的工作，它既搜集原料，又进行制作，制造出新鲜的蜂蜜来。所以，培根认为发现法比证明法高明。证明法把真理看成已知的，新的材料不过是为这个真理提供佐证而已。而发现法着眼于未来的创新。真理不是教条，要用新的经验来重新验证，并在研究中去发现和探索新的真理，它不是围着已知真理转，而是不断探寻新的真理。杜威不仅第一次科学而准确地揭示了培根新精神的实质，而且也为自己的研究找到了一条新的指导思想和新的研究思路。

杜威还从工业、政治、社会和宗教诸方面的发展变化，说明了时代精神的新的趋向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工业发展所形成的探险、开拓、发现的精神。从社会、政治的变化中，杜威发现并指明了个人解放和个性解放的重要意义。从宗教变革的变化中，杜威发现了宗教的个人主义。总之，从工业、政治和宗教的变革中，杜威看到了新思想产生的几种势力：第一，人们的兴趣从普遍的事物转向了变化的和特殊的事物，从对来世的重视转向对现世的重视，从对超自然主义的关注转向对自然科学、自然活动和自然交涉活动的关注。第二，固定的制度和阶级差别关系的崩溃，根据观察、实验和反省的方法达到对真理的个人信任增强了。权威命令已经失效，自然研究所起的作用和产生的效果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事情。任何神圣的原理都



要经过经验或实验来加以验证或确认。第三，进步的观念受到尊重。支配想象的是未来而不是过去。人类的黄金时代在未来，而不在过去。人们有能力、有勇气和有智慧去开创自己的未来。第四，支配自然和迫使自然为社会服务。实验探究是进步的惟一方法，知识就是力量。以上这些变化在哲学上的反映，就是哲学重心的转移，即以认识的或知识的唯心论取代形而上学的实体主义的唯心论。

其次，哲学改造中的科学因素。正如胡适指出，实验主义（杜威称自己的哲学为实验主义、工具主义或经验的自然主义）“这种新哲学完全是近代科学发达的结果。19世纪乃是科学史上最光荣的时代，不但科学的范围更扩大了，器械更完备了，方法更精密了，最重要的是科学的基本观念都有经过一番自觉的评判，受了一番根本的大变迁。”（《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4页）杜威在论及哲学的改造时，十分重视科学发展的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主要表现为：第一，古代的科学和哲学都认为世界是封闭的，而近代科学则证明世界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古代主张地球中心说，把宇宙看成一个封闭的体系，首先是太阳中心说冲破了地球中心说的封闭体系。这样，从哲学上就实现了从有限到无限，从静止到运动的转化。第二，古代的哲学家都把世界看成是固定的、静止常存，运动只是在一定范围之内的变化。但是，现代科学已证明世界是开放的，时空无限定，结构无限复杂，变化是无处不在的。“实在性”和功能性的标准也是在不断变化的。科学所说的运动的法则，是说明变化的相互关系，是说明一个变化相应的另一个变化，不同于古代那种在恒久之内的变化。第三，以前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性质不同，按照优

劣差别排列的等级系列。在开放的世界里，使研究和理解的界限被突破了，观察与想象也被解放了，力学已不再是孤立的科学了，它已变成为改造自然的工具了。机器和工具提供了人改造自然的工具，自然顺从了人意，不再充任神学的奴仆了。

总之，~~15~~16世纪是天文学和宇宙论广泛应用的时期；~~16~~17世纪是物理学和化学见诸应用的时期；~~17~~18世纪是地质学和生物学见诸应用的时期。科学的飞速发展，为哲学的改造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这为认识自然的方法的变革产生了想象和希望的心境。科学引进了无限的可能，无穷的进展，自由的运动和不拘界限的均等的机会等。所有这些，对社会制度的改造、新道德观念的形成、理想价值的确立、创造性的建设的哲学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基础和条件。

再次，现代科学突破性的进展所带来的现代危机以及权威的冲突对哲学的改造产生的影响。所谓现代的危机，是指科学长足发展所形成的新的观念与传统的旧的观念的冲突和对立。换句话说，就是科学的新观念向哲学的旧观念冲击，造成一种对立和矛盾的状态，从而使哲学陷入困境。

现代科学的发展向人们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维护科学原理同时又要维护价值领域。这就造成了科学与宗教的公开冲突。哲学不是解决天文学发展与基督教创世说之间的矛盾，而是要填平自然的基本原理与人生价值之间的鸿沟。杜威认为，如果人们把价值观念与实践活动联系起来，而不是与先前的实在联系起来，就不会产生上面的烦恼。如果把价值与人的实践行动的后果联系起来，那么对科学产生的疑问就纯属人为的了。

与这两者分歧相联系的三种观点：一种主张知识越揭示先

有存在，知识便越有效；另一种观点认为，有调节作用的目的或意向，只有属于存在或本质的特性时，方才有效；第三种认为，欲望、感情、爱好、需要、兴趣均属于人的经验，属经验的特性，这就肯定了自然知识是存在的。但许多思想家否认第三种观点，认为这种观点只关心眼前的问题，只涉及特定时间、地点与环境中的产生的感情、计划或意向中的状态，它不涉及最终实在，不涉及实有，不涉及不关心完整的关于实在的知识和一般原理。这样，由于科学所造成的现代危机，就迫使人们面对两个体系，即知识对象的信仰体系与理想价值的信仰体系。如何使二者适应，成为哲学有待解决的问题。

近代哲学存在一个内在矛盾，这就是一方面它要接受自古希腊以来所传下来的关于知识本性的结论，古代希腊哲学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对其本质是理想的至高的实在的思想是极其重要的。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奎那、斯宾诺莎、黑格尔等，他们都认为终极实在的本性是完全理想和合理的，它是以绝对的理想性和合理性成为哲学的必然属性，成为哲学上的至高至尊的理论权威。另一方面，自 17 世纪以来，我们对自然界有了崭新的看法，这就是自然科学经过系统地研究自然之后得出的结论。这种理论认为，古代传下来的关于知识本性的见解是错误的，它的目标和方法也是错误的，它的形式是神秘的。近代哲学一方面接受近代科学的结论，另一方面又保留古代思想的三个要素：(员) 只有固定不变的东西中才能找到确定性、安全性；(圆) 知识是达到内在稳定确切的东西的惟一道路；(猿) 实践的活动是一种低级事务，它所以有存在的必要，是因为人类具有兽性和求生的需要。这样，人类就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既要保留古代传下来的权威观点，又不能忽视并且

必须接受自然科学所证实的新结论，而两者又是针锋相对的。古代哲学权威与近代自然科学的权威处于尖锐对立之中，这就是权威的冲突。

杜威指出，人们既然把自然与精神两者对立起来，而同时又必须把二者联系起来。近代哲学既不肯坦率地承认自己是自然主义的，也不能无视物理科学的结论而把自己完全看成精神主义的。人类一方面是自然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是精神领域的成员，这样，一切问题都集中在人类这双重性上。杜威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斯宾诺莎以一种独特的方法，一方面把新科学理解为一种彻底的自然主义，另一方面又通过逻辑的技巧，同样全面地接受了从宗教传统演化而来的见解，即最后实在是衡量完善的标准和人类活动的规范。他还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为近代哲学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模式。他强调人心与整个自然是一个整体，因此认识心灵与认识自然应当是一致的。斯宾诺莎则试图把正确地指导人类行为、认识至高无上的实在和享受圆满不变的价值或善这三者结合成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

康德是调和自然性和道德权威的又一个典型，只是他把信仰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他划分了两个领域，一个是理智占统治的领域，另一个是意志要求至上的领域，两个领域不交界，不发生争吵。科学局限在时空现象内，而高级本体的实在世界则为理想的和精神的的价值所专有，每一个领域都有其裁判权和独立主权，康德的这两个领域既互相排斥，又互相需要，这两个因素镶嵌在一个完整的体系之中，这是一个调和的体系。

黑格尔则不同，他是从理智上和人格的实质上去把握已经



体现在现实世界的意义和价值，而且从逻辑的必然性出发，它们不过是最终实在即绝对观念的体现，从而证明这些意义和价值的有效性和绝对性。

通过对权威冲突的考查，可以看出，人们一方面要面对科学和实践的新结论，同时又要固守传统延续下来的两个理论前提：(㉕) 知识的对象是某种形式的最终实在；(㉖) 这种先在的实在是决定一切的东西。哲学如果坚持这两个理论前提，必然排斥和贬低实践活动。杜威指出，现代哲学所面临的任务，就是从自然科学的研究或实践活动在认知活动的实际过程和结果中去改造传统。通过这种改造，人们将会发现，实效性的标准和验证是在外部活动的后果中，并不存在于与认知活动相脱离的先在的实在中。所以，杜威认为，哲学与生活的隔绝是哲学的最大不幸，只有哲学与生活密切结合，才会有哲学的新生。

最后，科学是引起推动变革的决定力量。科学发展历史表明，随着科学上每一个重大发现的出现，不仅极大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总是要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科学的变化推动科学观的变化，而科学观的变化又推动着哲学观念的更新，推动着哲学的改造。

杜威认为，科学观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㉗) 人们对学术职业和工商业的不同看法，不仅影响了社会关系，也影响了哲学。过去人们一直把“工艺”和“科学”看做相等名词，对“工艺”与“文艺”加以区分，工艺属于低等，文艺则属于高等，前者是关于事情的艺术，而后者则是关于人事的艺术。工商业也属于低等的，学术职业则属于高等的。由于对职业以及所从事的工作的不同看法，由此产生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别与对立，知与行的区别与对立。哲学因此成为少数

贤人所从事的、研究高级领域“存在”的特殊工作。(圆) 古代科学和近代科学代表两种不同的态度。古代科学把对象作为最终的实在。古代科学和哲学认为，只有在固定不变的东西中，才能找到确定性和安全性，它们把追求形而上学作为自己的根本目标。近代科学实现了一个重大转变，即把对象（~~对象~~）变成了素材（~~对象~~）。对象与素材的差别在于，对象代表着最后完成了的，人们只需它界说、分类和逐渐证明，而素材则是需要进一步加工的东西，它只是征兆、证据、标志，是尚未达到的事物的线索，它是中间的，是手段，不是最终的结果。从对象向素材的转变，就从根本上取消了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性质。因此，这个转变是根本性的转变，是从本体世界向生活世界的转变。杜威关于经验世界的理论就是关于生活世界的理论，他把哲学从天上请到地上，使哲学成为人的生活中的良师益友。(猿) 伽利略所倡导的科学革命改变了人们的科学观和认识论。杜威认为，伽利略的重力实验有力地驳斥和打击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否定了牛顿力学理论的形而上学性质；非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创立清除了欧几里德几何学的本体论障碍。杜威指出，伽利略等人的工作不是科学上的演进，而是科学中的革命。这个变革，是从定性到定量，从差异到同一，从内在形式到关系，从美感和谐到数理公式，从静观鉴赏到积极操纵与控制，从静止到变化，从永恒到时间变化等等。对于杜威这个新哲学的代表，与传统哲学相比，不是一个演进，而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是一场革命。恰如梯利指出：“对杜威这个进化论者来说，实在决不是一个完全已有的、现成的和固定的体系，而是处于变化、成长和发展中的事物。”（《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 1975 年版，第 707 页）

这就是杜威在 1919 年出版的《哲学的改造》所要告诉我们的基本思想。1944 年之后，世界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化，于是杜威为 1944 年出版的《哲学的改造》写了一篇序言《二十五年之后看哲学的改造》，这篇序言在我国还是第一次与广大读者见面，杜威在这篇序言中向广大读者谈了四个问题。

第一，序言的指导精神。杜威指出：“本序言的写作也依据本文的精神。我坚信，相隔二十五年间发生的事件所导致的状况使哲学改造的需要同本书写作时相比变得更加紧迫；而且特别是，我相信目前的状况更加清楚地指出了所需的改造必须集中在哪一点，新的细微的发展必须从哪里着手。今天，哲学的改造这一标题比哲学中的改造更为合适。因为这段时间中发生的事情已明确了本文的基本假设，并使其发展到顶点，即，哲学的独特任务、问题和内容产生于共同组织生活的压力，在这种生活中哲学的特定形式产生了；所以，其特殊问题随不断进展的人类生活的变化而变化，有时在人类历史上构成危机和转折点。”

这一时期最大的冲击，莫过于“不安全与战争如此普遍，焦虑、悲观、无常成为流行态度。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在目前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投下了沉重的黑影”。杜威主要说明改造的原因，然后又指明了从哪里进行改造。他说：“现在要进行的改造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关于知识理论的，这应该是明显的。……新的理论将考虑认识（即正当的研究）如何进行，而不是假设必须使它顺应独立形成的关于器官的官能的观点。用刚才所指意义上的‘理智’替代‘理性’是所要求的变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主要讲述哲学分歧是如何产生的？说“哲学产生于

人类事务”，这一点不会引起分歧。但进一步，西方许多哲学家很快从这一出发点回到普遍的真理和永恒的存在之上，“它们被用来指明被看做是固定、不可改变，因此是超出时间，也就是永恒的东西”。这就是说，哲学经常是在肯定永恒不变的实在的理论前提下，承认变化，承认哲学与人类事务的联系。寻找不可改变的终极的东西似乎是哲学家的一种本能。

普遍性有两种，即科学的普遍性和哲学的普遍性。科学的普遍性不是由上帝或自然所确定的内在的内容普遍性，它是指适用的范围。在写作此序言时，杜威接到一份一位著名英国科学家最近所作的致辞。致辞中说：“科学发现经常被不经意地看做是某种可以补充旧知识的伟大体系的新知识的创造。对于全然琐细的发现，这种说法是对的。但对于科学发展最终依赖的基本发现，如机械规律、化学组合、进化论，这种说法不对。这些发现总是在新知识被创造之前引起对旧知识的毁灭或瓦解。”他在结尾时说：“我们需要一个扰乱部，一个受控制的烦恼来源；一个常规的摧毁者；一个自满的破坏者。”杜威在引用这位科学家的话之后，又进一步对科学与哲学作了区分。他说：“如果应用领域是特殊、有限的，到达它的通路是相对直接的——尽管有伴随其出现的情感喧闹——例如，达尔文的理论，它就是科学事例，如果其应用领域是广泛的，因此不能直接形成形式和内容服务于特殊研究的直接行为，它就被叫做‘哲学’。”

第三，杜威论证了目前哲学改造的主题和论题，他说：“改造的首要要素因此就是得出关于这个伟大变化如此广泛、深入、迅速发生的假说。这里提供的假说是，聚在一起的混乱构成了人类在世界范围内，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被卷入的危机，

这种混乱是由于进入了方法、物质和利益生活的日常事物行为，这种生活源于物质探究者在被称为实验室的相对孤立、遥远的专门车间里所做的工作。它不再干扰宗教信仰和实践而是干扰在短短几个世纪前现代科学兴起之前建立的制度。”这就出现了哲学上的二元论。物理学和生理学还可以被容忍，人们把它们列入低级物质的事物，而避免进入高级的精神“王国”。这种把“物质”与“精神”分割的方法，导致哲学上的二元论。杜威说他不直接反对这种二元论的观点。从另一个角度说，科学已经进入了普通的生活方式，而对陈旧制度的习俗的基础道德尚未进行科学探究和批评。这正是哲学所要做的改造工作。再孤立地看科学已经做不到了，“原子核裂变造成的破坏性使用成了攻击科学的惯用手段”。它直接涉及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这种状况对目前哲学的状态和需要进行改造的影响就是本序言的主题和论题。”科学再不是少数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的孤立的活动的，科学在飞速发展，科学已成为人们的一种生存方式。海德格尔说：“科学一般地可以被规定为通过诸真命题的相互联系而建立起来的整体。这个定义既不完全也不中肯。诸种科学都是人的活动，因而都包含有这种存在者（人）的存在方式。”（《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58页）科学与人的理想、规范和利益休戚相关。科学发展逼迫人们必须对近代哲学进行深入的改造。

第四，序言的最后部分。杜威全面地论证了哲学的改造的主题的必要性、艰巨性和可能性。杜威指出，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取得了重大的发展，但不能忘记和忽视哲学史在其中的功劳。“哲学史所完成的任务是科学家所完成的工作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当科学成果要求系统地表达时，就属于哲学的功

能。但一旦涉及人类的事务中时，就充满了困难和危险。他说：“在人类事务中，在广泛而深刻的关系中，发明的观点被看做是危险的和破坏的，会唤醒害怕和恐惧。这个事实虽重要，但很少受到注意，它被假定属于作为道德的道德本质和实质。这一事实证明了要进行的改造以及引起改造的每一次努力的极大困难。”

早期科学与公认制度性习俗之间处于一种分裂，只是一种休战，远未一体化。分为两个领域，两个“王国”，这种分裂只能持续一段时间，不能两全，随着科学的发展，两者之间矛盾与对立就会突出出来。“科学作为研究必然是发现，在发现中，旧的知识态度和结论不断让步于不同的和新的事物。权威丧失的事实在目前用人的本质的内在邪恶来说明这种失落的旧学说的复活中得到承认，在广泛流传的对人们的未来的悲观主义中展现。”这是道德的一个方面，如果确立一种理性的、积极的道德。“运用一种鞭策去发展一种道德理论……道德给人以积极的理性方向，而这种实际有效的道德将随我们的意愿利用资源，给人类生活的活动和兴趣带来秩序和安全，不仅是在混乱的地方，而是以过去从未有过的更大规模。”由此，杜威概括说：“简言之，从任何角度来看，哲学改造的问题原来是发端于发现如何完成在科学以及在工业和政治的人类局面中仍旧是初步并搅乱的新运动的努力之中。只有在目的和标准完全同人类相关，可以构成新的道德秩序的情况下，才能达到同自身运动方向和契机相一致的目的。”

序言一个基本思想告诉我们，哲学的改造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如果杜威今天还健在，我相信，他还会写出第二篇、第三篇乃至更多的文字，来继续他的哲学的改造的伟大工程。因

